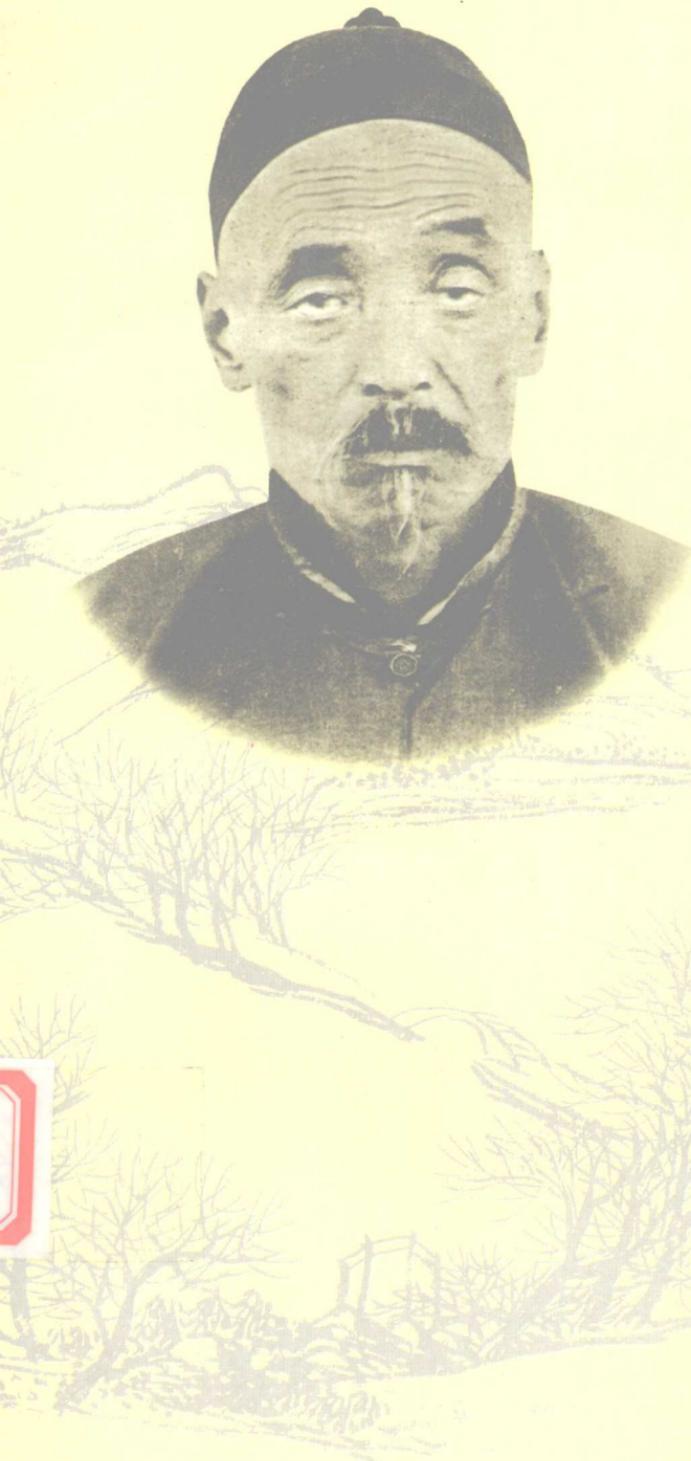


任大援 武占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劉古愚評傳



# 刘古愚评传

任大援 武占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1 号

刘古愚评传

LIUGUYU PINGZHUAN

任大援 武占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5 插页 2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224-04556-X/K · 747

定价：15.00 元

## 序

1898 年戊戌变法到 1998 年整整百年，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有了一百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探索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引起全国巨大影响，特别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戊戌维新变法可称之为起点。就拿当时比较闭塞的陕西来说，在探索新学，宣传科学救国，设立新式学校等方面，也有代表人物，如刘古愚先生（1843—1903 年）。他虽然不是戊戌变法的直接参与者，但是他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8 年，在他五十六岁时，曾经给康有为写信，对康的启蒙改革思想表示衷心的钦佩，并决定在兴学和宣传新学方面步其后尘，竭尽全力去做。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刘古愚在家坐等狱卒来捕，毫无惧色。毕竟他没有参加维新的实际政治活动，幸免于难。

刘光蓀，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人，他的一生始于晚清民族危机深重之时。在他诞生的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是因鸦片贸易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屈于英国压力签定五口通商章程之际。不久又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刘古愚熔铸了爱国忧民的情怀，于 1870 年（同治九

年庚午)肄业于关中书院，后又到味经书院。变法维新之际，受新思潮影响，创立讲会，筹办工厂，并到江浙考案，鼓吹河套屯田，教育改革，当时有“南康北刘”之称。变法失败，他在深山隐居，竭力经营义学，以教育兴国，为陕西培养了不少新学人材。

刘光瀛的著作是他去世后诸弟子编辑刊行的。最初由王含初、赵和庭搜集，张鹏一编定为《烟霞草堂文集》10卷，1914年在西安印行。翌年李岳瑞重编，1918年王典章(字幼农)在苏州出版。其后，王典章又与张鹏一等同门搜集其它遗著，于1921年刻成《烟霞草堂遗书》(17种21卷)，1925年出版《遗书续刻》(4种4卷)。《遗书》及《续刻》皆由王典章出资印行，前者出版于苏州，后者在南京面世。这就是现存《刘古愚先生全书》的全部内容。当时印数不多，如今坊间已不易见到。

综观刘古愚的一生，他受国内时势激荡，锐意改革，从教育入手。但是，地处偏僻的陕西，那里排拒新思想，对于新思潮人物不但不欢迎，反而加以压制，因而刘古愚的事业在陕西难以奠定基础。当然，一时一地并不能决定事业之成败，斯时的中国那能容忍革新的浪潮呢？

刘古愚一生的行事只能说是十九世纪末维新变法的支流，虽然未造成全国影响，但是他在陕西省创办新学，宣传新学，播种改革种子，后来终于在于右任先生等的身上开花结果。清朝末期、民国初年陕西的改革和

革命先辈，大都受过刘古愚的影响。可见教育虽然不能立即造成宏大声势，但是它润物细无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总会迸发出应有的威力的。说刘古愚是晚清时期的启蒙者、教育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我想，在纪念戊戌变法百年之际，有一件工作可以做，即维新变法的各个支流的情况，以及不大为人所知的启蒙者和维新者的思想和业绩，如果能够系统地加以整理，公之于世，这是功德无量的。关于刘古愚的研究，甚为薄弱，只见到张鹏一先生的《刘古愚年谱》（陕西旅游出版社版）。这本《年谱》原是1939年完稿，作为陕西教育史志研究丛书，于1989年公开出版，我以为，如果不深入发掘地域文化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那对于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逐渐重视，而且有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在戊戌维新百年纪念前夕，任大援、武占江同志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研究刘古愚著作和思想，写了一部《刘古愚评传》，篇幅较大，论述全面。我觉得这是一部有功力的学术性评传。我读了全稿以后，觉得非常高兴。这部评传，关于刘古愚的生平活动的分析介绍并不多，但对于他的思想分析占有较多的篇幅，且有新意。总之，这是一部研究性的评传，也是地域文化思想的学术著作，因而我很乐于为此书写序。

在文化思想的研究方面，我觉得需要拓宽领域，而

地域文化思想应当成为关注之点。中国学术文化根基深厚，著作浩如烟海，因而思想史的研究，也不能不从地域文化中发掘新人物、新面孔，把他们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写出来，以丰富中国思想文化的宝库。任大援、武占江同志的工作，我觉得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在纪念戊戌维新百年之际来出版《刘古愚评传》，也是非常合乎时宜的。

张岂之

1997年8月24日于北京清华园

# 目 录

序 .....	张岂之 (1)
<b>第一章 艰难时世 论学交友</b> .....	(1)
一 早经忧患 .....	(2)
二 游学长安 .....	(5)
<b>第二章 矢志化民 掌教“味经”</b> .....	(13)
一 心存天下 .....	(13)
二 设斋求友 .....	(17)
三 掌教味经 .....	(24)
四 刊布书籍 .....	(34)
五 处士横议 .....	(39)
<b>第三章 思济苍生 经世守身</b> .....	(46)
一 咸阳赈灾 .....	(46)
二 筹办保甲 .....	(50)
三 种树制蜡 .....	(54)
四 学术大旨 .....	(59)
五 提倡西艺 .....	(68)
<b>第四章 变法维新 求富求强（上）</b> .....	(77)
一 甲午之痛 .....	(77)
二 整顿书院 .....	(80)
三 创立讲会 .....	(88)
四 维新潮起 .....	(93)
五 筹办工厂 .....	(98)

六	派员南下	(105)
七	江浙考察	(112)
<b>第五章</b>	<b>变法维新 求富求强（下）</b>	(121)
一	壕堑战法	(121)
二	河套屯田	(129)
三	教育改革	(134)
四	南康北刘	(146)
五	临难不苟	(153)
<b>第六章</b>	<b>深山隐居 弘道甘凉</b>	(159)
一	经营义学	(159)
二	革新教育	(165)
三	深山讲武	(171)
四	筹办学堂	(175)
五	鞠躬尽瘁	(181)
<b>第七章</b>	<b>天地元气 良知不昧——理学思想（上）</b>	(186)
一	宇宙论	(187)
	(一) 理气论	(188)
	(二) “元”论	(189)
二	性论	(191)
三	明德说	(195)
	(一) 心与性	(195)
	(二) 明德与新民	(196)
四	明德的核心——意	(200)
	(一) 意的含义	(200)
	(二) 意与知	(202)
	(三) 意与行	(203)
<b>第八章</b>	<b>格物致和 尽物之性——理学思想（下）</b>	(204)
一	格物致和	(204)

---

二	明德的外化——意与情	(206)
三	治国平天下	(210)
四	刘光蕡理学思想的特点	(212)
<b>第九章</b>	<b>万法归宗 孝悌为本——伦理思想</b>	(216)
一	孝的伦理中心地位	(217)
二	孝道	(219)
三	孝道的进一步扩展	(221)
<b>第十章</b>	<b>工商为本 因财而圣——经济思想</b>	(225)
一	工商为本	(226)
二	经济的重要地位	(230)
<b>第十一章</b>	<b>抑君重民 “民主”臆想——政治思想</b>	(238)
一	民本主义	(238)
(一)	民为贵	(239)
(二)	君为轻	(241)
二	民主主义	(244)
三	政治思想的形成及评价	(246)
<b>第十二章</b>	<b>宏扬大道 以己注经——儒学经学观</b>	(251)
一	今文经学	(251)
二	传统与现代之间	(269)
 附 录:		
《烟霞草堂文集》序		康有为 (281)
《烟霞草堂遗书》序		康有为 (282)
刘古愚先生传		义宁陈三立撰 (283)
与康长素先生书		刘光蕡 (285)
康有为复书		(287)
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		刘光蕡 (289)

## 第一章 艰难时世 论学交友

一八九七年初春，在人声鼎沸、惊奇赞叹声不绝于耳的味经书院中，他看着刚从上海运回的铁制人力轧棉籽机，露出欣慰的微笑。世世代代用手工从事棉花加工的陕西父老乡亲们终于可以运用机器了。这在西北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募集百万银两购买大型织布机器，大力开发陕西棉花资源，为西北牟利，与外洋竞争，为中国保护资源的宏大设想仍在冲击着他的心扉，两年多的筹措奔走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两年来饱罹忧患的心，终于可以稍微舒缓一下了。

一八九八年八月，戊戌政变的政治恐怖西入潼关。泾阳县的差役们整装待发，只等巡抚一声令下，便去逮捕西北的“康党”。味经书院内人员寥寥，一片死寂，有人劝他赶快逃走避祸，此时的他已悲忿到了极点，厉声说：“国事如此，为国难而死，幸何如之？怎么能说逃跑呢？我就是‘康党’的罪魁！”面对生死大节，傲然不苟，凛凛气节，上干九霄。

一九〇三年八月，甘肃兰州大学堂。年届花甲的他仍在登台讲课，这是由他主持开办的新式大学堂。他所面对的是西北地区各个民族的年轻学生，他要教化他们以消除民族隔阂，共御沙俄觊觎，他为学生们论经史，讲数学，批课业。身患重病，不稍停息。弥留之际，尚在询问学堂某事办妥没有？身边的门生孝子早已泣不成声。

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身服儒冠，却不事科举；手无寸柄，却矢志富国强兵；长居江湖，却为国事忧伤涕零，忧忿之切，以至目盲。他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西北地区维新领袖，把西北带出漫漫中世纪长夜的伟大启蒙者——刘光贲。

## 一 早经忧患

刘光贲，字焕唐，原名一新，晚年自号古愚，一八四三年诞生于陕西咸阳马庄乡的一个生员家庭。当时的中国正在一步步地向黑暗沉沦。刘光贲出生之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殖民者欣喜若狂地把各种商品运进这个曾经锁闭多年的古老国家。

近代的陕西更是多灾多难。她早已失去了汉唐时期的那种全国中心的地位，曾经庇护了中国两个盛世的黄河、潼关如今成了与外界联系的屏障，渭河盆地成为一个封闭落后的地区。而灾难并没有被关山所阻隔。受南方农民起义的影响，陕甘回民在任武的领导下，于一八六二年揭起义旗，同年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部入陕，接着，捻军也进入陕西作战。阶级矛盾、民族冲突交织着，陕西面临着空前的灾难，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三个年头，到一八七四年才彻底结束。陕西经济遭受重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有的曾经有数十万之众的城市，战后仅存百余人。<sup>①</sup>战后又遭饥荒，赤地千里，树皮草根被“啜食几净”。刘光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

刘光贲的家庭虽不富裕，但却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父亲是县学生员，从小就教他读书诵经。《年谱》记载，他十五岁入乡塾

---

<sup>①</sup> 《刘古愚年谱》第十七页。

的时候，已是“诸经成诵”，开始阅读《通鉴纲目》。这使他得以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

但不幸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大约十六岁的时候（一八五八年）母亲魏氏病卒。一年之后，刚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刘光贲再次遭逢不幸：一八六〇年中秋节，阴云密布，寒气袭人，夜晚，天气更加恶劣，疾风挟着暴雨席卷而来，彻夜不停。就在这个传统的团圆之日，父亲刘蕴玉生命垂危，孝子亲人的悲切呼唤，终无济于世，天没亮便撒手人寰。此时的刘光贲尚未成年，父亲的去世使一家人失去了凝聚核心，而上苍却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让人肠断的日子，当时的他悲痛欲绝，这给他年轻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创痕，后来每忆及此事，则“伤感不置”。<sup>①</sup>这样他完全成为一个孤儿。刘光贲一共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一个。依赖兄长的资助，在十九岁时娶魏氏为妻，得以成家立室。

此时的中国，又经历了一次剧变。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英法侵略者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东北大片大片的膏腴沃野被鲸吞。英法侵略势力深入到长江流域，一八六〇年约后，清政府即命人将条约印刷，交各府尹、督抚宣布。

一八六一年，刘光贲赴县城应试，见到县衙墙上张贴着与各国所签的条约。在条约的末尾，英国国王、法国总统与清朝皇帝赫然并列。这年刘光贲十九岁，生活在内陆地区，成长在为经史所包围的文化氛围中。圣贤书上说，中国为天朝上国，广袤无垠，典章文物之盛远胜于周边蛮夷之国。而名不见经传的英法两国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并且他们的国王与总统竟和一向被

<sup>①</sup> 《刘古愚年谱》第九页。

国民视为天下独一无二的大清皇帝并列，这种事情对于传统思想氛围中生长起来的人们简直是当头一棒！年轻的刘光贲也不例外，他对此大为骇异。早年从经史上所学到的“华夷”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经典中的所谓蕞尔蛮夷并不能概括今日的世界，西洋蛮夷竟强于中华。他开始思考，西方国家的强大除了武器精良、船坚炮利之外，一定有深层的政治学术为基础。于是，他萌发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念头。另一方面，“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这样，中国固有的文化必将受到强劲的挑战，六经也许有一朝消灭之虞，于是他萌生了刊布经史的愿望。国家的不幸，通过一纸条约在刘光贲的心中激起了波澜，报国之志，强国之梦遂深深地扎根在他年轻的心中。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五月，陕西回民在任武的领导下在渭南起义，杀死团练大臣张芾，渭水两岸回民纷纷响应，关中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避乱，刘光贲辗转于兴平、礼泉之间，成为难民。最后暂居礼泉县城，贫困潦倒，栖身在文庙的小屋之中。晚上磨面，白天卖饽饽（bó tuó一种汤面），聊充饥肠。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书墨随身，不肯废学。<sup>①</sup>当时的战况特别紧张，礼泉县的居民，不分主客都被驱赶到城上，轮流防守，刘光贲也身与其事。晚上借城上的灯光细心读书。同年太平军将领扶王陈得才进入陕西，捻军张宗禹也转入陕西作战，四川的农民起义军也北上入秦，三秦地区陷入了更大的战乱之中。刘古愚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度过了三年的流亡生活。同治三年（一八六五年），应童子试为冠军，成为府学的生员，有了政府发给的廪饩，生活才初步安定下来，此时关中的战争也不是那么激烈了。是年刘光贲

---

<sup>①</sup> 《文集·附录·行状》。

二十三岁，进入西安求学，揭开了他生活中新的一页。

## 二 游学长安

从乡村走入都市，使刘的眼界为之一开。毕竟，当时的西安是陕甘两省的政治文化中心，陕甘总督的驻节地，两省的最高学府，有名的书院，如关中书院、宏道书院等均聚集于此。更重要的是他在关中书院结识了业师黄彭年及莫逆终生的两位挚友李寅（字敬恒）、柏景伟（字子俊）。

黄彭年，字子寿，贵州贵筑人（今属贵阳市）。翰林院编修，当时在陕西巡抚刘蓉府中充当幕僚，主讲于关中书院。黄彭年主持书院的时候，严订课程，广泛购置书籍，提倡实学。他所标举的实学即鸦片战争后龚魏所倡的经世致用之学。黄彭年看了刘光贲的文章很觉满意，便拿出《大学衍义》一册让刘诵习，读完再换第二册。第二天，刘光贲便去换第二册，黄感到很惊奇。一番考问之后，才发现这位年轻的生员已经全部掌握，便把《大学衍义》全部借给他。刘读完后，还书时还附有千字的心得，而且文理可观，切中要害，至此，黄彭年对他更加器重，师生间建立了深挚的情感。从学关中书院是刘光贲系统研究学问的开始，黄的赏识教导给他的学术思想打下了最初一层实学的底色。由于刘资质聪颖，更兼学习刻苦用功，在书院引起了同学们的注目，李寅就是此时与刘光贲成为终生挚友。

李寅与刘是同乡，居咸阳县庇礼村。父亲李善容，翰林院庶吉士，母亲殷氏，祖上曾为广东陆路提督，父亲亦为翰林院庶吉士。祖先豪侠的性格传到了远孙身上，殷夫人不尚粉黛，性情豪爽，生活俭朴，终身布衣，不喜华裳。幼读《论语》“略能上口，

既晓大义”。<sup>①</sup>李母屡生不育，晚年得子，当然对李寅溺爱有加，但丝毫不因此而放松了对儿子的教育。还在李寅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母亲便将字写在木版之上，自己念字，令儿子用手指出。优裕的家庭环境使李寅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性格得到了自由的发展。李寅少喜兵法，不屑为章句记诵之学，与当时热心科第的一般士子迥然不同，他“研究经史，泛览百家，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书画之类”<sup>②</sup>无不研习。性情豪放，闲暇之时则纵酒狂歌，属文赋诗，颇有艺术才情，以李太白自命。当时咸阳县江某激赏他的才情，致李于其门下。江某也是性情狂放豪爽，没有一般官僚的架子，师生甚为相得。同时互相往来的有四川谢维藩、临潼杨炳山等，相互酬唱，为世所瞩目。与刘光贲一样，年青的李寅也深为中国所面临的灾难而忧虑，苦思拯救之策，道及国事日危，不禁感慨激昂，痛哭欲绝。李寅也深受黄彭年的赏识，评其文曰：“古谊若龟鑑，忠肝贯金石，他日不徒以文名世也。”<sup>③</sup>

共同的抱国志向，使两人很快接近起来，经一席深谈，李寅深为所动，取出家藏的《王文成公阳明全集》让刘学习。遇有疑难，年长于刘的李寅便悉心讲授，剖析精微，娓娓不倦。后来，又让刘光贲遍读其家藏书。这对幼经离乱、无力购书而诚心向学的刘光贲来说不啻打开了一座新的宝库，此时刘光贲开始“服膺阳明之学”，李寅在学业上、物质上的帮助对刘古愚影响甚大，后来刘古愚回忆说，这时才初窥学术门径。<sup>④</sup>

<sup>①</sup> 《李母殷太宜人墓志铭》，载《烟霞草堂文集》卷四。以下引此简称《文集》。

<sup>②</sup> <sup>③</sup> 《翰林院编修李君行略》，《文集》卷三。

<sup>④</sup> 《刘古愚先生年谱》，第十六页。以下简称《年谱》。

除了李寅之外，对刘有很大影响的一位重要朋友便是柏景伟。

柏景伟，字子俊，西安冯籍村人，咸丰乙酉（一八五五年）举人，长刘十岁。与李寅一样，柏景伟也是不守括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喜欢谈论研究兵事。当时吏治腐败，官吏苟且偷惰，乡里豪绅欺压百姓，无所顾忌，年轻的柏景伟侠肝义胆，以抑强扶弱自任，声言，有敢欺凌贫民弱民者，我就是他们的人主！<sup>①</sup>有感于鸦片战争失败，东南多事，他组织上百名健壮青年，朝夕操练，以图异日报国。回民起义后他入提督傅先宗幕，赴甘肃作战。不久回家乡办团练，后来又入左宗棠幕府。刘、柏结交是在一八六七年。当时的柏景伟已是很有名望的人。听到有关刘光蕡的传闻，想让刘去见他，但耿直的刘并没有前去。后柏景伟亲赴关中书院访刘，正好刘光蕡外出，读了刘光蕡桌上的日记，大为佩服，叹曰：“此吾师也，何友之云！”<sup>②</sup>等刘光蕡归来之后，连榻长谈，互相激赏，遂成挚友。不久，柏、李二人亦订交，三人至此成为至交，亲逾兄弟，至死不渝。

刘光蕡的两位朋友人均豪放不羁，柏景伟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喜欢直来直去。<sup>③</sup>李寅中等身材，双目炯炯如电，有一身的武艺，食量很大，相当于普通人的两倍，舞巨槊，发狂歌，俨然一代英雄。他的火枪、弓箭都很娴熟，曾经与一个军官比武，发六箭中其五，周围一片喝采。经常与这三人一起来往的还有潼关的张听庵。此君亦有名士作风，喜谈兵事。左宗棠入陕伊始，曾受命为其招募陕西省士兵，后来左宗棠变卦不用。张听后大怒，即辞

<sup>①</sup> 《同知衔升用知县柏子俊先生墓志铭》，《文集》卷四。

<sup>②</sup> 《年谱》第十八页。

<sup>③</sup> 有关柏、李二人情性采自《文集》卷四、卷五，及《年谱》有关部分。